

緒 論

紀元文 李有成

—

二十世紀六〇年代的世界圖像面臨前所未有的巨大衝擊：戰後的休養生息已然蘊積強大的動能，社會、政治、文化、經濟等面向鬱然勃發的新生力量，強力挑戰形塑二十世紀前半葉的「進步」與無限發展榮景的現代性及其遺緒。在亞洲除了有中國大陸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之外，血戰十餘年的越戰，在死傷兩、三百萬人後，至一九七五年四月三十日西貢（今胡志明市）易幟才宣告結束；在歐洲則有勢如野火燎原的新左派風潮與學生運動；在北美洲爭取弱勢族裔權利的民權運動正如火如荼地展開。在這樣的政治與文化氛圍之下，許多新生事物與議題勃然興發，二十世紀後半葉的西洋文學批評與論述產業也因此打破各種學門之間的疆界與藩籬，力圖形塑眾聲喧譁、繁複多音的論述場域，影響所及，多元文化思維已然成爲主導當代人文與社會科學等學術場域的先鋒性動能源頭，爲人文與社會科學開創嶄新的想像閭域。

面臨這種急遽世變，文學思想領域的反應可謂如響斯應，批評與論述產業乃產生質變與量變。就前者而言，學門之間的疆界與藩籬逐漸泯滅與解構，往昔壁壘分明的科際疆界與畛域漸告消失，爲了因應許多新生事物與議題，跨學門的科際整合，乃至於文化研究逐漸冒現；去中心化的結果，釋放出多元論述的空間與能量，曩昔被壓抑與抹消的聲音——不管是遭斷舌的菲洛美拉

(Philomela) 或是殖民學舌的卡立班 (Caliban) —— 一夕之間無不奮力將心中之塊壘鬱結重新抒發，夜鶯的婉轉啼聲與被損害、被侮辱階層的泣血控訴乃相繼發而為聲，蔚為特殊歷史情境下的質詰與反擊，亦為重建文化位置與姿勢的努力。¹ 此舉不僅是出於內鑠心境之寫照，也是學而得之的書寫或銘記姿態。「在後殖民與後現代的歷史情境下，弱勢族裔與婦女團體逐漸取得發言的位置與再現的空間」(李有成 2007: 1)。明乎此，不論是探根溯源的結構主義、探勘知識與權力系譜的後結構主義，抑或辨析語言與現實游離的解構主義或後現代主義，在在豐富我們履勘文學與文化版圖的新視野。進入新的世紀，解構主義者已經著手綴集倫理議題，補益理論的盲點，作為反思的起點。畢竟文學與文化的研究終究還須回歸到人本身的社會和倫理的存在狀態。如同新古典主義名家波普 (Alexander Pope, 1688–1744) 所言：「瞭解你自身，毋僭妄審視上帝；／妥適的人類研究還是人本身。」²

在歐美文學的流變歷史進程中，生命書寫一向為廣受歡迎之敘事文體，不論是歐陸源遠流長的個人自白傳統，如聖奧古斯丁

¹ 後殖民論述中，有關失語噤聲與殖民學舌 (colonial mimicry) 均出自古典作品。雅典國王的女兒菲洛美拉 (Philomela) 遭其姊夫色雷斯 (Tharace) 國王臺留斯 (Tereus) 強暴，被割舌噤語，以防其洩漏實情，後其姊普洛克娜 (Procne) 為其復仇，烹殺小王子以饗國王，姊妹旋逃逸，化為夜鶯。事見奧維德《變形記》(Ovid 1971)。卡立班 (Caliban) 係莎士比亞《暴風雨》(The Tempest) 一劇中女巫希克瑞克斯 (Sycorax) 的兒子，半人半獸，形狀醜惡猥瑣。被放逐於孤島的米蘭國王普洛斯佩羅 (Prospero) 以魔法將其收服，當作奴隸，卡立班生性桀傲，屢有反抗。詳見《暴風雨》(Shakespeare 1961)。

² 十八世紀英國的社會思想主軸高舉理性主義大纛，亦有理性年代 (the age of reason) 之謂，標榜人本主義之觀念與價值。波普所倡導的人性之研究，具有啓蒙 (enlightenment) 的意涵，肯定個人的主體性，以經驗實證論取代神學與玄學的迷障與羈縻，把個人從教會與封建體制當中解放，聲言「人乃是絕對唯一的族類」(Fussell 1971: 75)。有關人本主義的討論，詳見 Fussell (69–76)。要言之，波普之論點與生命書寫的議題亦頗有適切性。原詩出自於〈論人〉(“Essay on Man”)：“Know then thyself, presume not God to scan;/The proper study of Mankind is Man” (Pope 1951: 138)。

(Saint Augustine of Hippo, 354–430) 與盧梭的《懺悔錄》(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Confessions*, 1770, 1782 出版)、華滋沃斯 (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 的精神自傳《詩序》(*The Prelude*, 1799), 或者晚近如巴特 (Roland Barthes, 1915–1980) 自我剖析的文化批評回憶錄 (*Roland Barthes by Roland Barthes*, 1977), 都是重新發現自我之傑作。此外, 歐洲清教徒移民美洲新大陸的殖民墾荒日記與講道詞、美國革命建國元勳的自傳、新英格蘭作家的札記與隨筆、內戰前後常見的黑奴自述, 乃至於弱勢族裔因移民的「美國夢」碎而以血淚寫就的回憶錄等等, 其內涵與議題莫不契合新世界的地理空間, 儼然自成傳統。這些都是彌足珍貴的文化資產, 實為深入了解歐美文學精奧底蘊的重要參證文本。

西方回顧生命歷程的敘述傳統綿遠流長, 為他人立傳的情形相當普遍, 當代社會更見若干政界、財經、影視名人等熱衷此道。由於這些人的身分、職務跟當前流行的話題或時尚關係較為密切, 容易引起人們的好奇或窺視慾 (voyeurism), 回憶錄、自傳及傳記的出版經常洛陽紙貴, 寫作者也因此名利雙收 (Seidensticker 1999: 47; Eakin 2004: 1)。近幾年來, 在媒體的推波助瀾之下, 自白文化頗為流行, 大量的自傳、傳記及回憶錄相繼問世, 流風所及, 有關生命歷史的敘述遂形成風潮。批評家易荊 (Paul John Eakin) 因此指出, 「在這些發展的刺激之下, 批評家乃鑄造新詞生命書寫 (*life writing*), 以涵蓋當代個人書寫的多變形式, 包括訪談、寫照 (profiles)、民族誌、個案研究、日記、網頁等等」 (Eakin 2004: 1)。

在二十一世紀伊始, 自傳、傳記、書信、回憶錄等文體的理論研究, 因為文學與文化生產中倫理議題的崛興而備受注意。最典型的例子是女性主義者的介入。二十世紀末期, 為重新了解, 詮釋一九六〇、七〇年代古斯朵夫 (George Gusdolf)、勒傑恩 (Philippe Lejeune)、翁尼 (James Olney) 等人所提出的自傳理

論，女性主義者在後結構主義思潮的衝擊下，從文本的罅隙中發掘被壓制的聲音，這些理論的探討與更新確實有助於深化理解作家在其文本中所銘刻的生命軌跡。二〇〇四年女性主義批評家羅絲（Ellen Cronan Rose）為《現代文學學報》（*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主編傳記文學專輯，對生命書寫提供了多層面的深入討論。二〇〇九年，《新構成》（*New Formations*）期刊也推出有關生命書寫研究的專號，其中不乏女性主義者的論文。編者泰樂（Jenny Bourne Taylor）和卡柏蘭（Cora Kaplan）在專號前言中，開章明義點出了當代生命書寫研究的主要關懷：「由於生命書寫涵蓋了個人與集體記憶的多層次過程，個人與集體記憶又塑造了共享的與個體的回憶，我們的焦點就擺在生命書寫的多樣性實踐……」（Taylor and Kaplan 2009: 7）。在同一個專號中，英國女性主義者薛葛兒（Lynne Segal）在其專文中談到她的回憶錄《製造麻煩》（*Making Trouble*）時，特別希望此書不要被歸類為回憶錄。她認為《製造麻煩》不能算是她的故事：「我只是再度探討過去已經討論過的議題，描繪我個人參與或疏離很快就被稱為『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的特定模式、衝突、聯盟及錯誤聯盟，雖然這一次不是那麼理論性，採用的還是比較個人的聲音」（Segal 2009: 120）。薛葛兒的話無異於揭露了生命書寫中個體與集體的糾葛現象：生命書寫既是個人的，也是集體的，與《新構成》生命書寫專號編者的關懷若合符節。

女性主義批評家米勒（Nancy K. Miller）認為，在討論自傳或傳記中的自我時，個人隱私、優缺點等特性將暴露在讀者大眾面前，自我防衛的力量因此相對脆弱：「當我們將生命的敘事透過生命書寫的形式暴露於他人面前，我們不是都成為脆弱主體了嗎」（Miller 2004: 159）？寇瑟（G. Thomas Couser）討論生命書寫的著作《脆弱主體：倫理與生命書寫》（*Vulnerable Subjects: Ethics and Life Writing*）即以此為書名。根據寇瑟的看法，被再現的客體因為年齡、生理、心理、社會、經濟、文化等方面居於相對的

弱勢地位，與再現的中介者（mediator）的權力關係是不對等的；此外，感情上的信賴或親密關係更使得被再現者處於被動、不利的地位（2004: xii）。美國自白詩派（confessional poetry）詩人賽克斯頓（Ann Sexton, 1928–1974）的書翰集中有不少詩人的自畫像，這位素以大膽描繪各種禁忌題材著稱，且患有精神焦慮症的詩人最終以自盡結束自己的生命，歐慈（Joyce Carol Oates, 1938–）在討論賽克斯頓的詩與書信時這樣表示：「如果有一種最終、最暴烈的暴露自我的勇氣，以毫無限制、毫無掩飾的藝術呈現藝術家自身，那麼賽克斯頓就是這位具有高度勇氣的女性」（Oates 1983: 183）。³可見所謂脆弱主體有時候不一定那麼脆弱。

誠如以上所述，與一九八〇年代的情形大異其趣的是，晚近對生命書寫的興趣多少肇因於文學研究上的倫理轉向。一九八〇年代，若干所謂私密文學（*littérature intime*）——包括自傳、傳記、回憶錄、日記、書信等，當時生命書寫一詞尚不多見——的研究蔚為風氣，原因與後結構主義所帶動的語言轉向大有關係。就以自傳研究而論，在後結構主義的影響之下，自傳研究的重心轉移到自傳的文本性（textuality），強調自傳中的自我或主

³ 二〇〇〇年前後，有關生命書寫之專論甚多，學術界的老鳳新雛競發新聲，各擅勝場。茲按出版年代，臚列部分資料如下：James Olney, *Memory and Narrative: The Weave of Life-Writing* (1998); Suzette A. Henke, *Shattered Subjects: Trauma and Testimony in Women's Life-Writing* (1998); Linda H. Peterson, *Traditions of Victorian Women's Autobiography: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Life Writing* (2001); Lauren Rusk, *The Life Writing of Otherness: Woolf, Baldwin, Kingston, and Winterson* (2002); Gunnthorunn Gudmundsdottir, *Borderlines: Autobiography and Fiction in Postmodern Life Writing* (2003); G. Thomas Couser, *Vulnerable Subjects: Ethics and Life Writing* (2004); Paul John Eakin, ed., *The Ethics of Life Writing* (2004); Cynthia Huff, *Women's Life Writing and Imagined Communities* (2005); Thomas Larson, *The Memoir and the Memoirist: Reading and Writing Personal Narrative* (2007); Patricia Hampl and Elaine Tyler May, eds., *Tell Me True: Memoir, History, and Writing a Life* (2008).

體為語言的構成，並視自傳書寫為文本化的過程；而在此文本化的過程中，自傳計畫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什麼樣的自傳計畫就會形塑什麼樣的自傳文本。換句話說，是自傳生產傳主的生平，而非生平生產自傳。德·曼（Paul de Man）的話可以概括這樣的立論或觀點：

我們真的那麼確定自傳仰賴指涉，就像照片仰賴其主體或（寫實）圖畫仰賴其模型嗎？我們假定生平產生自傳，就像行為產生結果一樣，但同樣的道理，我們難道不能說，自傳計畫本身也可以產生並決定生平，而且作者寫什麼，其實受制於其自畫像的技巧要求，因此各方面是被其媒介之策略所決定的？（de Man 1984: 69）

換成巴特的話，那就是「窗框創造場景」（Barthes 1974: 54）。

由於後結構主義的符號理論視語言為變動不居的載體，在語言的操弄下，自傳的自我或主體不僅是語言的構成，最終亦且像語言那樣，本身就是游離而不穩定的。在此情形之下，勒傑恩所謂的自傳契約（the autobiographical pact）——作者、敘事者及傳主三位一體共享同一身分——難免要面對質疑與挑戰（Lejeune 1989: 14）。即使自傳書寫最為依賴的記憶，在後結構主義的觀照下，也從聖奧古斯丁所說的庫房變成了自傳中最大的問題：記憶也必須經歷文本化的過程，而在此過程中因受到語言修辭的中介，自傳文本中的記憶與原先從庫房中選取的記憶已經大不相同。因此我們看到的只是潛伏於文本中的記憶——隱晦、流動、曖昧，而且在閱讀的過程中不斷遭到修飾、抹除、甚至遺忘（李有成 2006: 40–41）。薛葛兒在《新構成》發表的論文中對這個現象也有類似的反省，雖然她用的不是後結構主義的語言：「過去二十年儘管對記憶的迷惑甚至執迷不減，一點不錯，記憶是個脆弱的東西，對所有的幻覺與自欺——不管是有意識或無意識——

都脆弱無比。……今天的箴言是，沒有記憶會缺少遺忘，沒有遺忘會缺少記憶」(Segal 2009: 121)。

從語言轉向到倫理轉向，用林玉玲 (Shirley Geok-lin Lim) 的話說，其實是從自我書寫 (self-writing) 到生命書寫 (life-writing) 的一個轉向 (Lim 2007: 24)。這個轉向也意味著新的研究導向必然超越對自我或個體生命的關注，轉而嘗試將個體生命與群體生命連結，生命書寫即使仍有其展演性 (performativity)，卻也不再只是個人自我意識的行為，而是隱含集體意志的政治或社會過程。在少數族裔、弱勢群體、女性、第三世界、後殖民的生命書寫中，這個面向早就存在，倫理轉向只是讓這個面向更為彰顯而已。以我們較熟悉的傳統而言，從魯迅的《朝花夕拾》，到蔣夢麟的《西潮》，到楊絳的《幹校六記》，到齊邦媛的《巨流河》，類似的例子比比皆是。在我們的文學傳統中，從〈太史公自序〉以降，生命書寫從來就是很嚴肅的事，從來就不缺倫理的層面，個人或家族的生命點滴經常被賦予更大的家國或社稷寓意。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 嘗以國族寓言 (national allegory) 一語涵蓋第三世界的文學，這個說法有意將第三世界文學統歸為宏大敘事，其中扞格，不言而喻，正因為實證上難免掛一漏萬，也曾經引發不少爭議，不過用以描述現代華文文學的生命書寫傳統，在我們看來卻頗為生動貼切。

林玉玲也以美國文學中的生命書寫傳統為例，說明此傳統如何超越個人，指涉社群，具有豐富的倫理意義。她說：

美國生命的書寫……幾乎總已是超越個人的個性的，因為這樣的書寫幾乎總已是為種族化、性別化、階級與區域構成，以及許多其他形式的社會身分過程所分裂，也幾乎總會意識到這一切。換言之，個人的「個性」……總已是建構在美國的生命書寫中，成為更大的紛擾的社會、經濟及政治結構與力量的一部分。在道格拉斯

(Frederick Douglass) 的自傳、杜布埃斯 (W. E. B. Du Bois) 的《黑人的靈魂》(*Souls of Black Folk*)、水仙花 (Edith Eaton/Sui Sin Far) 的〈一個歐亞混血者的心靈畫頁〉(“Leaves from the Mental Portfolio of an Eurasian”)、湯亭亭 (Maxine Hong Kingston) 的《女戰士》(*The Woman Warrior*) 和《中國佬》(*China Men*) 及其他書寫中，我們看到這樣的放大情形。……作家如果自視為某個集體——國民、種族，或任何方面都屬弱勢（族裔、少數分子、女性、身障者等等）——的一分子，勢必很難書寫肖像型的自傳，把整個敘事縮減為只是個人的個性，也就是自我書寫。相反的是，我們所說的生命書寫必然會採用與自傳相關、卻又有所區隔的文類型態：歷史、實錄、日記、散文，甚至詩。(Lim 2007: 24)

顯然，生命書寫不只關心書寫而已，同時還要關心生命，避免讓生命書寫中的自我被孤立在其他眾多自我之外，在社群關係之外。生命書寫的倫理在於如何讓生命擺脫自我的狹窄視域，將之置入群體或集體的關係脈絡中來審視和理解。甚至生命書寫極度仰賴的記憶，雖然自個體出發，但是因為個體與社會的關係，最後仍不免被視為社會的建構，個人的記憶因此亦是集體記憶的一部分。



有鑒於西方人文學界對生命書寫研究的新發展和新趨勢，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乃於二〇〇七年十月二十六至二十七日以「生命書寫」為主題舉辦研討會，廣邀不同領域的學者從自傳、傳記、回憶錄、札記、日記、遊記、書信等文類，剖析歐美作家如

何於不同的時空中，摹繪與再現生活現實與生命軌跡，並鐫刻與建構自我之身體、記憶及身分認同，希望透過理論的探討與文本的分析，深入探討若干與生命書寫相關的議題，藉以開展更寬廣的對話與思辯空間。《生命書寫》一書所收錄的十二篇論文即為這次研討會的部分成果。這些論文依規定外審，並經《歐美研究》季刊編輯委員會會議審查通過。

這些論文的涵蓋面甚廣，為閱讀方便，我們將論文粗分為兩輯。第一輯涉及美國主流文學與弱勢族裔文學，包括亞裔與原住民文學、生態論述，以及身障者與被領養者的回憶錄等。第二輯探討歐陸的女性自傳與華裔澳洲作家之生命境況。本書輯錄的論文所牽涉的議題也相當多元繁複，除我們所熟知的種族、族裔性、階級、性別之外，尚旁及離散、民族主義、跨國文化等。更重要的是，這些論文多能從不同的角度與面向回應生命書寫的倫理轉向，將生命書寫置於更大的論述脈絡中，審視自我與社會、記憶與歷史、個體與集體的複雜關係。

第一輯的八篇論文所討論的議題都是在後殖民或後現代的脈絡之下，緊扣弱勢族裔跨國與跨文化的離散經驗，以及反思資本主義邏輯所造成的生態廢墟。每篇論文皆針對特定的作家和文本進行詮釋，有縱深的理論鋪陳與闡述，兼及對文本中再現符號與隱喻的解析。王智明的〈翻譯的生命：容閔、留學、跨國主體性〉一文，研究清季因列強與帝國主義的欺凌，在師法西洋文明、「脫亞入美」蔚為當時風尚的時代氛圍下，派遣幼童留學研習科技乃是自強運動富國強兵計畫之一環。容閔的自傳《西學東漸記》(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1909) 闡述在這種殖民與跨國的脈絡下，傳主如何以「亞洲導向」的策略實踐國族、文化、身分之遙譯與再生。換言之，容閔的翻譯志業前衛地開創亞美族裔論述的空間，「將亞美研究的論述場域，有效地從公民身分與同化經驗，轉移到離散跨越與異變的討論。」

單德興的〈說故事·創新生：析論湯亭亭的《第五和平書》〉

一文，係剖析湯亭亭的《第五和平書》(Maxine Hong Kingston, *The Fifth Book of Peace*, 2003)，如何再現／連結 (represent/articulate) 作家的個人困境與越戰退伍軍人的創傷，透過「正念禪」(Mindfulness) 的修行與實踐，山火與兵燹的傷痛與劫難不復是夢縈魂牽的執念，而是浴火重生之契機。戰爭的傷悼哀慟讓湯亭亭體會到越戰退伍軍人歷劫的創傷，毅然投入退伍軍人寫作班，以書寫作為治療與救贖的工具，拒絕失憶 (amnesia)，傳承經驗並致力於和平工作。他們相濡以沫，「以集體的方式來面對並書寫自己的傷慟，反省戰爭與暴力的性質，致力於書寫和平與和平書寫」。

傅士珍的論文〈「卡洛斯」的美國夢：卜婁杉《美國在心中》的「自我」書寫〉主要在探討菲律賓裔美國作家卜婁杉 (Carlos Bulosan) 的自傳性作品《美國在心中》(*America Is in the Heart: A Personal History*, 1943, 1946)。作者從解構主義的視角觀察文字再現的過程所呈現的差異，這個差異乃出於個人觀點、立場、文字的再現功能等。因此自傳的「真實性」是「有條件的真實，有著慾望投射、計畫編撰的痕跡」。卡洛斯作為前殖民地的人民歌頌「美國夢」，但他也透過對於皮諾伊 (Pinoy，居於美國的菲律賓人之間的暱稱) 移民血淚史的考掘，控訴美國的殖民政策，暴露美國社會種族歧視的惡行與語言暴力。這種集體經驗乃是一種「族裔生命書寫」(ethnobiography)。

馮品佳的論文〈血緣／血言：《血之語言》與跨國收養書寫〉係研究韓裔美國作家鄭敬娥 (Jane Jeong Trenka) 的回憶錄《血之語言》(*The Language of Blood: A Memoir*, 2005)。作者以「種族性精神分裂」(racial schizophrenia) 診斷文化差異的齟齬，以及收養關係中因尋根而造成的恩斷情絕的痛苦。就像帝王蝶 (monarch butterfly) 是跨國女性被收養者的象徵，他們反復往返的遷徙行動 (migration)，而非單向移居 (emigrate)，可說是全球化人員流動的先聲。回憶錄拼貼的文體更是典型的後殖民與

後現代特徵：「這本以片斷、揉雜文體的形式呈現被收養人的生命經驗的回憶錄，試圖解讀敬娥在跨國收養的脈絡裡如何想像以及再現女性的身體與關係網絡」。

黃心雅的〈美國原住民的自我書寫與生命創化：以荷根與安嫺姿為例〉則援引批評家王荷莎 (Hertha D. Sweet Wong) 有關原住民文學的理論，探討個人與群體的融合，以及平等和諧與萬物共存的宇宙觀。論文析論兩位原住民女作家的作品：荷根 (Linda Hogan) 的《關照世間的女子》(*The Woman Who Watches over the World*, 2001) 指出遷徙 (migrancy) 與流離失所是美洲原住民在白人殖民主義下的宿命，「原住民成為異鄉客，在自己的家園被放逐。」安嫺姿 (Anita Endrezze) 的《擲火向陽，擲水朝月》(*Throwing Fire at the Sun, Water at the Moon*, 2000) 則以「遊徙詩學」(“poetics of migrancy”) 解構語言的霸權，召喚墨美女性書寫，跨越邊境與書寫傳統。

梁一萍的〈混血風景：維茲諾與歐溫斯的生命書寫〉援引巴特有關相片、攝影「此曾在」(ça a été) 的理論解構自傳書寫傳統，在「反身自觀」的視角下審視自傳的真實性，了解作者與傳主如何重新「組裝」自我。維茲諾 (Gerald Vizenor) 的《內心風景》(*Interior Landscape: Autobiographical Myths and Metaphors*) 與歐溫斯 (Louis Owens) 的《混血訊息》(*Mixedblood Messages*) 分別以編年體的敘述組構離散社群的圖像與跨越文類的混血書寫 (神話、電影評論、家族歷史、生態、攝影等)，形成別具風格的原住民生命書寫。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原住民作家所採用的再現策略挪用各類文本、檔案及媒介，形塑自身的敘述文本與發聲位置，取代殖民者的傳統文類體制。

蔡振興的論文〈史耐德與生命書寫／詩學〉旨在研究美國六〇年代「落拓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 的詩人史耐德 (Gary Snyder, 1935-) 如何從日本與中國文化中學習禪及其精神，並將之融入詩中以豐富美國文化之傳統。作者爬梳詩人豐富的詩作中，

並援用「深度生態學」(depth ecology) 批判資本主義消費文化的侵蝕與斷害，其主要論點則聚焦於《石砌馬道與寒山詩》(*Riprap and Cold Mountain Poems*, 1965) 與《山水無盡》(*Mountains and Rivers without End*, 1996) 這兩冊詩集。詩人強調以入世佛教的精神從事日常生活的修為與實踐，以對他者／非人 (the other/the nonhuman) 之重視消弭現代性之弊病，泯除「人與自然、整體和片段、主體和客體、立與破、現實與虛構等」的對立，並「融入拉岡所謂的『小客體』(objet a) 迴路中」，也就是佛教所謂的「涅槃」(nirvana) 之境。

盧莉茹的〈敘述發現：《路易斯與克拉爾克的日記》中之自然史論述與國族文化建構〉係以美國探險家於十九世紀初探勘美國西部領土自然資源、生態、地理景觀等自然書寫紀錄，剖析國族意識形成的過程、變遷與鞏固。路易斯 (Meriwether Lewis) 與克拉爾克 (William Clark) 透過對於地理空間的觀察、自然資源 (動物、植物、礦物等) 的分析、生態關懷以及西部國土的獨特性，闡述廣闊的西部荒野對於新的共和國的意義，以及作為未來理想、憧憬想像之空間，並藉此凝聚美國，因為當時「『美國』這個詞彙仍然是個閃爍不定的模糊觀念」。事實上，歷代的美國讀者透過此一文本，見證知識、檔案的度藏、分佈與配置，既強化美國的國力，同時也引進生態關懷與環保理念。

在第二輯的論文中，劉雪珍的〈身體與文本的對話：閱讀《瑪喬芮·坎普之書》〉研究現存英國中古文學中歷史最為久遠的女性自傳文本產製的過程，以及當時宗教、父權意識對文本的滲透與改寫。瑪格麗·坎普 (Margery Kempe) 雖為文盲，但頗富貲財，為了記錄產後其精神疾病因偶遇宗教神秘主義之經驗而痊癒，特地委請書寫員筆錄其生命故事。在歷次的謄寫中教士扮演至為重要的角色，她「必須仰賴『壓迫者』的合作以進入父系教權中心，記入歷史。」論文特別指出，文中層層堆疊、沉澱、累積的元素，揉雜並混合呈現中心與邊緣的交鋒：「陽剛與陰柔、心靈與身體、

教會與世俗、書寫與口語」形成多聲複音的豐富文本。

秦曼儀的〈女性友誼通信小說的出版與閱讀：法國十八世紀女作家與讀者—友人的感性分享〉探討十八世紀法國女性作家書信寫作與性別、禮儀規範及文化生產機制之間的關係。書信體寫作是當時流行的文化活動，具有雙重的功能：不只是聯繫人際關係之媒介，也是作家表達其創作理念與認知的場域，因此「以殷勤文雅風格書寫的友誼書信，結合了社交性與藝術性……可能透過印刷出版，以展示上流社會的生活美學。」論文運用史居德里小姐（Madeleine de Scudery）〈關於寫信的方式〉（“De la Manière d’écrire des letters”，1684）與狄德羅（Denis Diderot）為《百科全書》（*Encyclopedie*）所撰寫的「寫信」一詞之理論，分別探討多位法國女作家之書信文本，包括曼特農夫人（Madame de Maintenon）、夏何耶夫人（Madame de Charriere）等。

許綺玲的〈W 島的運動寓言與／或童年回憶〉係研究法國籍波蘭猶太裔作家培瑞克（Georges Perec）的自傳／小說《W 或童年回憶》（*W ou le Souvenir d’Enfance*, 1975）中真實與虛構交互出現的再現策略。敘述的主線一則是敘述者回憶童年往事，另一則是諧擬探險小說的反烏托邦故事。童年的記憶破碎零散，而少小杜撰、長大後出版的運動島故事，召喚敘述者所經歷的極權統治與殘酷戰爭。因此，看似不相干的兩個文本，實則其關連性在於敘述者本身，「兩則故事出自同一人之手，交集就在於自傳的核心人物／作者『我』」，穿梭於虛實之間的敘述者，其游移流動的身分，輝映兩個文本中再現的現實之不確定性。

李翠玉的〈況味人生：黃貞才與伍曠琴之膳飲與生命書寫〉探討兩位華裔女作家如何透過膳飲文化建構離散社群的歷史記憶與文化想像。論文所剖析的文本分別是華裔澳洲作家黃貞才（Lilian Ng）的《銀姐》（*Silver Sister*, 1993）與華裔美國作家伍曠琴（Mei Ng）的《生啖中國菜》（*Eating Chinese Food Naked*, 1998）。《銀姐》的敘述者出身奴婢，地位卑微，在其流離遷徙

的經歷中，檢視離散社群的膳飲文化所呈現的「文化、階級、社會」之差異性。《生啖中國菜》中的李露比則是從都會女性知識分子的觀點，透過食材、口味、烹調方式的選擇等面向，歸結膳飲與性別、認同、慾望的關連。

三

本書收錄的十二篇論文涵蓋的時間從中古迄至當代，空間方面則包括亞洲、澳洲、美洲、歐洲等，具有全球化跨越疆界的趨向。本書另有下列數點特色：一、除重視弱勢族裔（華裔、菲裔、韓裔、猶太裔、原住民等）的聲音外，文本的題材更觸及階級、性別、種族、生態、自然書寫等議題。尤可注意的是性別平等的實踐，特別著重女性之聲音。在論文所探討的十七位作家中，更有十位具有少數族裔移民的身分，他們或是第二、三代的移民後裔、美洲原住民、前殖民地的子民，或是被迫遷徙的跨國收養人口。在經歷不同時空的歧視、排擠、打壓、消音之後，他們轉而重新檢視自身漂泊離散的經驗，繼承另類的文化傳統，建構不同的文化想像，從同化政策與對立政治轉向差異政治，並經由存活策略取得新的發言位置。二、顛覆傳統的書寫方式，開創另類的生命書寫體例。少數族裔書寫重要的特徵之一即為顛覆既有的文類畛域，因為現行的文化出版機制與產業既由主流社會所掌握，弱勢族裔突圍之道只有透過衝撞體制才能另覓生機，否則只是在既定的軌轍中複製文化工業的消費模式而已。這也就是何以弱勢族裔的生命書寫經常是「令人不知所措的」形式實驗。⁴ 三、在

⁴ 俄國形式主義 (Russian Formalism) 之文藝理論採用「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 一詞，說明閱聽大眾對於陌生、實驗性質的藝術形式之抗拒態度，因為對一般人而言，生活在熟習的跡轍中最高為安適。對於藝術家而言，要將熟悉的事物改頭換面才有新意。此即藝術形式突破與創新之原則。很多新事物的冒現與其所衍生之論述皆可作如是觀。

全球化的脈絡下，重新思考與評價他者（the Other）的異質文化價值。中國、日本、韓國、菲律賓等亞洲文化與原住民的生態論述均對美國文化的再生與復甦發揮一定程度的影響力，而歐洲離散社群的戰爭浩劫也引發人們對於啓蒙主義等現代文明的反思。隨著移民、技術人員的跨國流動，疆界逐漸泯除，如何對待、悅納他者更是當今世界重要的倫理課題。

在價值多元化的社會裡，眾聲喧譁，百花齊放，弱勢族裔與主流社會頡頏、周旋、協商的經驗，自然會吸引讀者的注意，自傳、傳記、日記、書翰、回憶錄、遊記等生命書寫的文類，由於其再現與遙譯的日常生活現實與文化現象對於各該社會有其相關性與適切性，因而廣受歡迎也就不足為奇。對於弱勢族裔特別熱中於生命書寫，批評家易荊有以下的說明：「我是有頭有臉的人物，度過很有價值的一生。任何生命故事隱晦的訴求皆精確地肯定此一價值，這個故事值得述說與聆聽」（Eakin 2004: 5）。從各種廣泛雜陳的生命書寫看來，生命的軌跡不同，正如同書寫的體例系出多門，概無定則，既不復是傳統知人論世的生平實錄或起居注，也非有聞必錄的繫年紀實。⁵ 不管是自傳式的「我」，或是

⁵ 豪斯（Craig Howes）以敘述的觀點研究生命書寫所涵蓋的範疇，他認為生命書寫不復侷限於傳統自傳、傳記所表述的生命歷史或經驗的記載，而是具有更寬廣的彈性涵納文本中所建構的現實（2004: 248-250）。另請參考史蜜斯（Sidonie Smith）與華特生（Julia Watson）以內部、外部敘述觀點區分自傳與傳記之畛域：「人們書寫其生命……同時會從外部與內部觀點為之」（qtd. Howes 2004: 249）。在〈危機傳記〉（“Memoirs of Crisis”）一文中，歐慈提到讀者對於傳記文類的期待，是要獲取更多關於傳主身分的事實，但結果可能不盡如此：「理論上講，傳記的優勢是讀者可以迅速進入『真實生活』，免除了富於想像力的文學的隱喻的構思和障礙。最強有力的傳記可能寫得很美，但美並不是傳記的要點。像羅伯特·洛威爾（Robert Lowell）的一句名言，『為什麼不說發生了什麼事呢？』（歐茨 2006: 198）。顯而易見地，傳記文本中的事實並不如表面上看來那麼單純，一如小說中所建構的現實並不能夠等同於實際生活中的現實，對於現實的質疑，其爭議性如出一轍。亦請參見歐慈在〈新式回憶錄〉（“‘New Memoir’: Alice Sebold’s *Lucky*”）一文中針對生命書寫中精神／心理層面之剖析（2006: 109）。

出諸於小說、遊記形式的第三人稱的說話人 (persona)，生命書寫所觸及的生命核心價值，乃至於人生的衝突、創傷、離散或戰爭經驗等無不令人動容，值得我們深思。

引文書目

中文

- 李有成。2006。〈自傳與文學系統〉。《在理論的年代》。台北：允晨文化。
頁 24-53。
- 。2007。〈開幕詞〉。「生命書寫」研討會，2007 年 10 月 26-27 日。
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 喬伊斯·卡羅爾·歐茨 [歐慈] 著。2006。《直言不諱：觀點和評論》。徐
穎果譯。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

英文

- Barthes, Roland. 1974. *S/Z*. Trans. Richard Miller. New York: Hill and Wang.
- Couser, G. Thomas. 2004. *Vulnerable Subjects: Ethics and Life Writing*.
Ithaca, NY: Cornell UP.
- de Man, Paul. 1984. *The Rhetoric of Romanticism*. New York: Columbia
UP.
- Eakin, Paul John. 2004. "Introduction: Mapping the Ethics of Life Writing."
The Ethics of Life Writing. Ed. Paul John Eakin. Ithaca, NY: Cornell
UP. 1-16.
- Fussell, Paul. 1971. "What Is 'Humanism'?" *Backgrounds to Eighteenth-*
century Literature. Ed. Kathleen Williams. Scranton, PA: Chandler
Pub. Co. 68-94.
- Howes, Craig. 2004. "Afterword." *The Ethics of Life Writing*. Ed. Paul
John Eakin. Ithaca, NY: Cornell UP. 244-264.
- Lejeune, Philippe. 1989. *On Autobiography*. Minneapolis, MN: U of Min-
nesota P.
- Lim, Shirley Geok-lin. 2007. "Academic and Other Memoirs: Memory,
Poetry, and the Body." *Ethnic Life Writing and Histories: Genres,
Performance, and Culture*. Ed. Rocío G. Davis, Jaume Aurell, and
Ana Beatriz Delgado. Berlin, Germany: Lit Verlag. 22-39.
- Miller, K. Nancy. 2004. "The Ethics of Betrayal: Diary of a Memoirist." *The
Ethics of Life Writing*. Ed. Paul John Eakin. Ithaca, NY: Cornell UP.
147-160.
- Oates, Joyce Carol. 1983. *The Profane Art: Essays and Reviews*. New
York: Persea Books.

- . 2005. *Uncensored: Views and (Re)views*. Hopewell, NJ: Ecco Pr.
- Ovid. 1971. *Metamorphoses*. Trans. Mary M. Innes. Harmondsworth, UK: Penguin. 147–153.
- Pope, Alexander. 1951. “Essay on Man: Epistle II.” *Alexander Pope: Selected Poetry and Prose*. Ed. William K. Wimsatt, Jr. New York: Holt. 138–146.
- Rose, Ellen Cronan. 2004. “Editor’s Introduction.”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28. 1: v–viii.
- Segal, Lynne. 2009.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Feminist Memoir Writing.” *New Formations* 67: 120–133.
- Seidensticker, Edward. 1999. “Autobiography.” *Biography* 22. 1: 46–56.
- Shakespeare, William. 1961. *The Tempest*. *Shakespeare: The Complete Works*. Ed. G. B. Harrison. New York: Harcourt. 1471–1501.
- Taylor, Jenney Bourne, and Cora Kaplan. 2009. “Editorial.” *New Formations* 67: 7–9.